

第一章 导 言

本书试图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青藏高原草原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与草地生态问题及其关系作系统深入的研究。旨在探寻草原牧区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并据此提出对策思路和政策建议，以供政府部门作决策参考。

第一节 基本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草地大国之一，拥有 40000 万公顷草地，草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41.7%（国家统计局，2000：5）^①。中国的草地总面积仅次于澳大利亚居第二位，在亚洲居第一位（FAO，1996）。中国的天然草地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牧区，牧区（半牧区）土地总面积达 360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37%（艾云航，2000：175）；牧区、半牧区草地面积 30000 万公顷，占全国草地总面积的 75%（国家统计局，2000：37）。内蒙古牧区、西藏牧区、新疆牧区、青海牧区、甘肃（甘南、河西）牧区和四川（阿坝、甘孜）牧区为全国 6 大草原牧区。

青藏高原不仅是中国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地区，也是全国最大

括号内为文献作者、文献发表年份及页码。下同。

的草原地区。全国 6 大草原牧区中的 4 大牧区，即西藏牧区、青海牧区、四川牧区和甘肃牧区，均位于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有 108 个牧区半牧区县，占全国牧区半牧区县总数（266 个县）的 41%，其中牧区县 57 个，半牧区县 51 个。青藏高原草地总面积约 14000 万公顷，占全国草地总面积的 36%，是全国天然草地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地区。目前，天然草地急剧退化，经济发展滞后，是青藏高原草原牧区面临的两大突出问题。

一、草地退化问题

生态环境总体退化。青藏牧区生态环境退化不是某一方面的退化，而是该地区生态环境的总体性退化。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四川省数据中含重庆市）生态环境退化状况所作的研究，青藏牧区所在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肃 4 省区的整体生态环境退化问题十分突出。除四川省外，西藏、青海、甘肃 3 省区的整体生态退化压力指数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均属于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中整体生态退化压力最大的 7 个省区之列（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309）。

草地退化。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特别是 1980 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青藏高原的天然草地退化面积呈迅速扩大态势。据农业部 1990 和 1999 年公布的统计数据，1980 年青藏高原草地退化面积合计约为 2421 万公顷，草地退化率（退化面积占可利用面积比例）为 20%；到 1996 年，青藏高原草地退化面积已达到 4010 万公顷，草地退化率已上升至 33%（表 1-1）。据此推算，1980~1996 年的 16 年间，青藏高原天然草地退化面积平均每年增加约 100 万公顷，草地退化率平均每年上升近 1 个百分点。同期，全国草地退化率平均每年上升为 0.4 个百分点，青藏高原草地退化速度是全国草地退化速度平均值的 2 倍。

表 1-1 全国及青藏高原天然草地退化面积：1980—1996

地区	草地可利用面积 (万公顷)	草地退化面积 (万公顷)		草地退化率 (%)	
		1980	1996	1980	1996
全国	33100	5824	7774	17.6	23.5
青藏高原	12250	2421	4010	19.8	32.7
西藏	7085	1417	2100	20.0	29.6
青海	3153	511	1090	16.2	34.6
四川牧区	1217	200	398	16.4	32.7
甘肃牧区	795	293	422	36.9	53.1

资料来源：草地可利用面积数据，来自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农科院草原所、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会（1994：2~3）；1980年草地退化面积，来自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国家统计局（1990：698~699）；1996年草地退化面积，来自农业部（见陆大道等，2001：210），其中全国为1995年数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308~309）。

草地和土地荒漠化、沙漠化。青藏高原是中国荒漠化、沙漠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西藏、青海荒漠化土地面积合计为7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青海省的土地总面积），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的23%。其中西藏52万平方公里，青海24万平方公里。西藏、青海沙化土地总面积目前已达3297万公顷，其中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438万公顷（陆大道等，2001：211），并且沙化土地每年仍以4%以上的速度扩展。这些沙化土地大多分布于青海湖环湖地区、柴达木盆地、黄河长江源区、藏北高原。甘南牧区、河西牧区、四川牧区的草地沙化、盐碱化趋势和水土流失也在不断加剧。

自然生态系统萎缩。青藏高原和青藏牧区的生态退化还表现为：天然草地面积和天然林面积缩小，雪线上升，冰川退缩，湖泊水位下降和湖泊、河流干枯，许多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大幅度下降，藏羚羊、冬虫夏草等不少珍稀物种濒危灭绝（陆大道等，2001：206~220；胡鞍钢等，2001：233）。

青藏高原和青藏牧区生态退化给当地和全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与

损失正在逐步显现出来。青藏牧区草地退化和整体生态环境恶化，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和当地经济发展，而且大大弱化了草地、森林、湖泊等自然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功能、生态屏障功能、生态净化功能和生态调节功能，对黄河、长江、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在全国和西北内陆地区具有重要意义的大江大河的水资源供给能力造成了严重威胁，加剧了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

二、经济发展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里，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现代科学文化的推广应用，青藏高原牧区的经济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牧区的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卫生条件有了显著改善，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然而，同国内发达地区相比较，青藏高原草原牧区仍然属于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1. 城市化、工业化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国家民委、国家统计局，2003），青藏高原108个牧区半牧区县的总人口为513万人，其中农牧业人口约470万人，城市化率仅为8%左右。同期，全国城市化率为37%，西部地区城市化率为28%。

2. 牧民收入水平低下。根据《中国畜牧业年鉴》（2001）公布的统计数据（表1-2），2000年西藏、青海、四川、甘肃4省区的牧区半牧区县共有牧业人口约400万人，牧民年人均收入约1372元，仅相当于2000年全国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的59%。

3. 草地牧业增长缓慢。草地牧业是青藏高原牧区的支柱产业，西藏、青海、四川、甘肃4省区的牧区半牧区牧民人均收入的70%至90%以上来自牧业收入。但是，1980年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在全国经济以平均每年8%以上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

青藏高原牧区草地牧业经济的增长却相当缓慢。1981—2000年，青藏高原4个地区合计的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只有2.5%；1991—2000年，青海牧区和甘肃牧区的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不足2%（表1-3）。

表1-2 2000年牧区、半牧区县牧业人口和人均收入

地区	牧业人口 (万人)		牧民人均收入 (元)		占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例 (%)	
	牧区	半牧区	牧区	半牧区	牧区	半牧区
西藏	40	20	1537	1976	68.3	87.7
青海	56	3	1451	1257	64.4	55.8
四川	35	136	931	1042	41.3	46.2
甘肃	25	84	1886	1660	83.7	73.7
合计	157 ^a	243	1428	1336	63.4	59.3

注：(1) a 为约数合计数；(2) 资料来源：牧区半牧区县牧业人口及人均收入数据来自中国畜牧业年鉴编委会（2001）。

表1-3 1981—2000年青藏高原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

地区	1981—1990年	1991—2000年
西藏	2.65	2.46
青海牧区	2.27	1.61
四川牧区	3.19	3.13
甘肃牧区	2.25	1.97

注：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是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几何增长率。牧业产值数据来自西藏、青海、四川、甘肃4省区历年统计年鉴。

三、经济社会意义

青藏高原草原牧区的特点可概括为“绿（绿色屏障）、少”（少数民族聚居）、“边（西部边疆）、富（自然资源富集）”。（1）

全国性的生态功能区。青藏牧区是具有全国意义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功能区，其草地、森林、湖泊、湿地、河流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全国性的绿色生态屏障；同时，青藏牧区也是中国生态环境最独特、最脆弱的地区。(2) 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草原牧区。青藏牧区是中国藏族为主体民族的草原牧区，是藏族人口的主要居住区；青藏牧区境内共同生活着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哈萨克族等以草原畜牧业为主业的游牧民族，以及汉族、羌族、回族等 10 多个民族，是中国各地区中地域面积最大、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3) 重要的边疆地区。青藏牧区位居中国西部边疆，是在国防、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同时又是远离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边远地区。(4) 自然资源富集地区。青藏牧区是中国的自然资源富集地区，是全国各地区中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等战略资源，以及草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青藏牧区的“绿”“少”“边”“富”四大特征，无不与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密切相关。在我国的生态环境、民族关系、国防和国家安全、资源供给等关系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领域，青藏高原草原牧区均具有不容忽视的战略地位。因此，青藏牧区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必须从国家总体战略角度来认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所要达到的四大战略目标，是现阶段国家制定和实施有关民族政策、生态环境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政策目标。以上四大目标，也是青藏高原草原牧区实施大开发战略的基本战略目标。

青藏牧区的特点，决定了改善和保护青藏牧区生态环境、加强青藏地区民族团结、维护西部边疆社会稳定、合理开发青藏牧区自然资源促进少数民族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均具有超出青藏牧区局部范围的重大意义，其效果都具有关系到全国公共利益的外部性或外

溢性特征。同时，青藏牧区的生态保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三者之间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因而，应当而且必须把这三个方面纳入统一的框架内来认识，而不能将其割裂开、就事论事、孤立地看待。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和实施有关的生态环境政策、民族政策、社会文化政策、社会福利政策、资源开发与地区发展政策，应从国家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出发加以通盘考虑，处理好各项具体政策与国家总体战略目标之间以及环境政策、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尽量减少不同政策间的冲突与摩擦。

青藏高原草地生态退化问题和牧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症结在于：(1) 加快青藏牧区经济发展和改善、保护草地生态环境不仅具有紧迫性，而且其意义也远远超出了青藏高原的局部范围，它关系到中国 21 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进程，关系到国家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2) 加快少数民族牧区经济发展与保护草地生态环境两大目标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过去几十年里，在牧区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天然草地的严重退化，草地退化不但制约了牧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大大降低了草地的生态功能，从而对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供给、生态环境和气候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如何把加快牧区经济发展与保护草地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走一条经济社会发展和草地生态保护相互协调、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的牧区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青藏高原牧区是具有全国意义的生态功能区，也是草地生态退化最严重的地区，而加快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青藏高原草地生态退化问题的根本途径。青藏高原牧区位居长江黄河等主要水系的上游源头地带，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最脆弱、草地生态退化最严重的地区。青藏高原牧区草地退化的日益加剧，已经对江河源头地区生态平衡、全国水资源供给、西部边

疆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如何遏制青藏高原牧区草地急剧退化势头、改善草地生态环境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导致草地生态退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因而需要采取综合性的对策措施来加以解决。但是，如果仅仅把治理草地退化看做是一个单纯的生态建设问题，只采取诸如退耕还草（林）、治理草地沙化、控制牧区牲畜数量、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和禁牧区这样一些措施，而不改造牧区传统的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和发展模式，不改变牧区贫困落后状态，使其走上持续稳定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不建立起一整套能使牧区生态、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的体制、制度和政策体系，就不可能消除导致牧区草地退化的主因和根源，也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草地生态日益恶化的趋势。牧区草地生态退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必须纳入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内来研究和解决。

加快青藏高原牧区经济发展对于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和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牧区发展必须走一条生态、经济、社会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青藏高原牧区是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也是我国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主要居住区，而且地处边疆，是我国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的边疆地区。青藏牧区经济社会贫困落后的现状及其与内地发达地区乃至邻近地区日渐扩大的发展差距，同这一地区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民族宗教关系、民族宗教矛盾等因素交互作用，已使得牧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成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加快牧区经济发展具有紧迫性，然而国内外大量的经验和西部牧区的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发展同保护生态环境往往是矛盾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常常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草地牧区在我国占有特殊而重要的生态地位，是具有全国意义的生态功能区，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态地位不允许草地牧区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先污染（破坏）后治理”式的传统发展道路，而只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那种不顾生态后果和生态效应，把加快牧区经济发

展、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同保护草地生态环境相互分离，甚至相互对立的经济开发思路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从长远看，既无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无助于生态环境保护。把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与草地生态保护统一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将是草原牧区的必然选择。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牧区这样一个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草原地区，如何在草地生态不受破坏的前提下求得经济快速发展，如何走一条草地生态和牧区经济社会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国内外现有的发展理论和经验尚未提供一个成功的模式或范例。因此，把青藏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和草地生态问题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来研究，也是探讨欠发达草原地区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本要求。

青藏牧区的生态经济问题在西部少数民族牧区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草地生态退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牧区普遍存在的问题，而青藏牧区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更为复杂，在西部各牧区中更具代表性、更有典型意义。从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看，这一地区几乎汇集了西部牧区各种主要的气候—地理特征、生物种群和草地生态系统类型。从社会人文环境方面看，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草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以及牧区（半农半牧区）与农区、乡村与城市、草原牧业与农业在这一地带内纵横交错同时并存，使青藏牧区形成了在我国独一无二、极具多样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文环境。青藏高原牧区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为我们探讨少数民族草原地区的生态经济问题提供了适宜的研究对象和背景，深入研究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经济问题，不仅对青藏高原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和推动整个西部少数民族牧区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二节 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西部草原牧区的历史、民族、宗教、民俗、文化和艺术，国内外学者已作过较为详尽的研究（满达人，1995：1~171）。在自然科学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科学家对西部牧区的草地植被、草地类型、各类草地的面积及其分布、草地生态系统和草地初级生产力，以及牧区气候、降水、地貌、土壤等做了卓有成效的系统研究，发表了《中国草地资源数据》（农业部畜牧兽医司、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92）、《西藏草原》（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1992）、《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中国科学院内蒙宁夏综合考察队，1980）、《草原生态系统研究》（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1985）等一大批研究成果。然而，对当代中国草原牧区发展问题的研究，却一直非常薄弱，甚至未引起国内主流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理论界应有的重视。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问题、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沙尘暴等生态环境问题、水资源和其他战略资源供给问题的日渐凸显，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西部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业已引起国家决策部门及学术界的关注。治理草地退化、保护草地生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已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内容列入中央和西部各省区的战略规划。在近期发表的有关中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开发、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农村和农牧业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大量研究文献中，对西部草原牧区的生态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几乎均有所论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对策建议。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西部牧区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纳为

以下四个方面：(1) 牧区草地生态退化；(2) 草地生态经济模式；(3) 草地牧业经济发展；(4) 游牧传统文化。

一、草地生态退化

牧区草地退化是最近几年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关的研究一致认为，草地（或草原）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西部牧区天然草地在我国占有显著的生态地位（金岚等，1992：179；张新时，2000：3~5；康维新，2000：18~19；王玉，2001：42）；西部牧区草地已普遍出现较为严重的退化，而且退化草地面积呈急剧扩大趋势，西部牧区草地生态急剧退化是导致近年来我国北方沙尘暴频发、长江黄河泥沙量增加、江河源头地区生态恶化、西北部内陆河流和湖泊萎缩干枯、黄河中下游和西北地区水资源供给紧张等问题的一个主要因素（宋瑞祥，2000：1~2；曲格平，2000：3~7）。徐嵩龄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还对草地生态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了估算（徐嵩龄，1997：5~9），认为损失巨大且呈增大趋势（李周、孙若梅，2000：30~31）。

很多学者对导致牧区草地退化和沙化的原因及治理对策作了研究探讨。大部分学者认为，草地过度放牧、过度农垦，以及滥采滥挖滥伐等人为因素是导致我国西部牧区草地急剧退化和沙化的主要原因（巴图、邵霖，1993：67~69；吴精华，1995：1~5；王玉，2000：43~44；樊胜岳、高新才，2000：37~39；李周、孙若梅，2000：10~11），同时也与我国西北部地区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及其长期演化趋势有很大关系（朱震达、刘恕，1989；张林源、王乃昂，1994：91~92；施雅风，2000：29~30）。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上述人为因素只是导致草地退化沙化的直接原因或表层原因，除此以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但对导致草地退化的深层原因和社会经济机制的认识却存在较大分歧。一部分学者把草地退化主要归因于牧区人口膨胀（刘玉满，1992：17~19；施雅风，2000：29~

30；樊胜岳、高新才，2000：37~39）以及农牧民经济行为的盲目性（王玉，2001：42~44）；有的学者则强调内地农业人口迁入和过度农垦是牧区草地退化的根本原因（包玉山、周瑞，2001：74~77）；也有学者认为导致牧区草地退化沙化的根源不在于人口压力过大，而在于不合理的经济发展考核统计制度和生态治理体制（张贯益，2001：92~94）；还有学者指出草地建设滞后、国家草地生态建设投入不足、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欠缺、相关法规不健全、有关的牧区经济政策不合理等也是造成草地生态退化的重要因素（巴图、邵霖，1993：67~69；王关区，2001：88~89）；另有论者试图用“公共牧场的悲剧”和“囚犯难题”来解释引致草地资源过度利用的制度根源（张敦福，1997；许成安等，2001：41~42）；也有人认为少数民族牧区传统的草原牧业经济模式，特别是粗放型的牧业增长方式，是导致牧区草地超载过牧和退化的根源（邓艾，1994：10~20）。大部分论者根据草地生态退化原因的认识提出了相应对策，主要有：退耕还草（林），控制牧区牲畜数量，健全法制以杜绝过度放牧、过度开垦和滥采滥挖滥伐，控制牧区的人口增长和人口迁入，建立草地生态功能保护区，加大国家对草地建设和草地生态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改革相关统计制度和生态治理体制、构建生态治理产业，并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财政税收制度及政策。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在西部牧区应圈定一些“无居民区”或禁牧区，实行居民搬迁、牛羊下山、休牧育草（杨森林，2000：103~107；温生辉，2001：112~115），认为建立禁牧区、禁止人类进入这些地区从事生产生活活动“不再去打扰这些宝贵的净土”是保护西部生态环境最便捷的途径（完颜生男，2001：33~35）。

二、生态经济模式

对草地生态经济模式的研究源于一些学者对治理草地退化和土地荒漠化问题更为深入的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新时认为，草地

退化的治理和草地的建设，不仅仅依靠于个别的高新技术与优良品种，而更重要的是在系统和整体的层次上构建一系列优化的模式（张新时，2000：3）。樊胜岳、高新才等学者也认为，由于我国目前治理荒漠化的种树种草、围栏封育等主要措施没有把这些区域内的人口压力释放出去，故不能根治荒漠化。因此荒漠化的治理不能仅仅限于种树种草和围栏封育，而是要突破技术层面的限制，从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相结合的角度，把荒漠化治理与农村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荒漠化防治的生态经济模式（樊胜岳、高新才，2000：39~40）。目前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如下三种：

1. 张新时从生态学角度提出的草地优化生态—生产范式。张新时认为，所谓草地优化生态—生产范式，就是“根据草地景观（地形、气候、植被、土壤、基质、水文等因子的结合）的有规律重复出现的复合体及其能流与物流运转途径，合理地配置土地利用类型与管理方式，以发挥其最大或最佳的生态功能、生产潜力与经济效益，亦即可持续农业的优化生态—生产范式”。而“优化”是指农林草（牧）系统的科学合理、高效优质、持续稳定、协调有序；“生态”是指生态系统的结构、食物链关系、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与生物地球物理过程；“范式”是指生态管理系统、区域景观格局与功能带组合配置的范例。这种草地优化生态生产范式，“必须既是在生态上健全可靠的，又是在经济和生产上合理可行的”。认为我国西北草地生态经济范式大致可分为五种基本类型：蒙古高原草原范式，鄂尔多斯沙地范式，荒漠山地—盆地范式，黄土高原范式，农牧过渡带范式。并对这五种范式的主要内容做了阐述（张新时，2000：3~7）。

2. 樊胜岳和高新才从经济学和生态学相结合角度提出的基于荒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模式。樊胜岳和高新才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提出，荒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模式应由三个方面构成：（1）以荒漠化地区资源高效利用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2）以荒漠化治理为主要内容的沙漠生态恢复；（3）以农业工业化为主要内

核的产业经济发展。“上述三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纽带，构成了荒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理论模式”。并指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农牧民的经济收入，是从根本上消除荒漠化的关键一环；推动农村工业化进程，在荒漠化地区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轻工业体系，从而稳定拉动农业结构调整，使荒漠化地区由农业发展阶段向工业阶段过渡，使生态系统中过度的人口压力，沿着产业链从农业内部传递到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土地荒漠化的根源（樊胜岳、高新才，2000：40~44）。

3. 马戎和潘乃谷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模式。马戎和潘乃谷认为，草原牧业地区由于其地理、经济、人口等各方面的特殊性，可以视为一类区域性的生态环境系统；牧区草地生态系统的研究，涉及社会、经济、民族、人口、文化、生态等许多方面，必须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的社区发展个案研究结合起来。牧区草地生态系统大致包括4个基本要素：自然、植被、牲畜、人口及组织。草地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草地生态系统4要素之间的和谐配合，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脱离了其他环节而明显变化，都会带来相互之间的失衡而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两位学者在运用社会学方法对内蒙古北部牧区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的历史变迁作典型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北方草原牧区的理想发展模式，应当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其特点就是十分小心和谨慎地保持一个和谐、平衡的生态系统，这是保持草地畜牧业的生态基础，需要使草地生态系统中的人、畜、草、气候这4个基本要素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使草地畜牧业得到长期和稳定的可持续发展（马戎、潘乃谷，2000：104~126）。

三、草地牧业发展

近期理论界对牧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草地牧业

经济发展或牧区传统草地牧业的现代化改造方面。1988年詹武主编出版的《中国畜牧业经济学》是国内首部研究中国畜牧业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而1992年邵霖、李俊生发表的《草原畜牧业经济论》则是专门探讨牧区草地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学术专著。1993年巴图、邵霖发表的专著《中国草原畜牧业经济发展概论》、1996年道尔吉帕拉木发表的专著《集约化草原畜牧业》和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少数民族牧区草地畜牧业的发展问题。这一方面的研究认为，草地畜牧业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牧区的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和优势产业（邵霖、李俊生，1992：30~39）；加快草地畜牧业经济发展，推动牧区传统草地畜牧业向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畜牧业转变的进程，不仅直接关系到西部草原牧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对于满足我国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对草畜类畜产品的需求，对于促进我国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和出口创汇，以及对于维护我国西北部边疆社会稳定、巩固国防、加强民族团结和改善牧区草地生态，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巴图、邵霖，1993：77~96；邓艾，1996a：31~33；艾云航，2000：176~177；吴兰，2000：44~46）。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草地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草地畜牧业的现代化，可以用牧区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来概括。关于牧区传统草地畜牧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有人认为主要是草地畜牧业生产手段、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的现代化（吴兰，2000：46）；但更多的论者认为，牧区传统草地畜牧业的现代化不仅是指畜牧业生产手段、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指草地畜牧业经济运行方式的商品化和市场化（邵霖、李俊生，1992：85~157；巴图、邵霖，1993：165~265；暴庆五、额尔敦布和，1992：56~60；邓艾，1996b：171~177）。研究者认为，少数民族牧区传统的自给半自给性、生存性、初级性、粗放性草地畜牧业向商品化、商业化、专业化、集约化的现代畜牧业过渡，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历若干阶段；并就现阶段在牧区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牧区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等方面政府

应采取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建议。部分学者还对政府对牧区畜牧业的宏观调控（潘建伟、张立忠，1995：174~177）、牧区草地经营权股份化（敖仁其，1998：199~203）等问题作了探讨。

四、传统游牧文化

近年来，部分学者还从文化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角度，对西部牧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草地生态保护和牧区发展的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反思。南文渊认为，世居青藏高原的藏族，历史上为了在脆弱而又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形成了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民族传统文化或藏族生态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民族生态文化，对在西部大开发中建设生态文明有重要意义；而藏族牧区传统的随季节变换逐水草而居、有规律游牧的生产方式和节俭简单的生活方式，则是藏族游牧社会长期以来寻找到的与高原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因而能长期存在且在保护高原生态环境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藏族牧区未来发展中“保留或改善游牧生活方式，无论对高原自然环境保护，还是对藏族优秀文化的保留，都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南文渊，2000：4~6）。麻国庆认为，虽然现有的研究大多把导致草地生态退化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人为因素，但对人为影响草地生态的途径和方式，以及社会结构、文化体系、价值观念与草地生态的关系，却很少给予关注（麻国庆，2001：53）；蒙古族的传统游牧技术、居住格局、轮牧方式以及蒙古族的宗教价值与环境伦理等方面，蕴含着丰富的民间环境知识，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考虑其合理的内涵（麻国庆，2001：51~57）。另外，陈亚艳关于藏族神山崇拜与自然保护（陈亚艳，2000：80~83）、额谷岚关于蒙古族禁忌习俗中的环境保护意识（额谷岚，2000：84~86）孟慧英关于畜牧经济与萨满教的关系（孟慧英，2001：46~51）等有关的研究中，也对游牧民族文化中的合理内涵和环境观念作了探讨。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最近十多年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马戎、潘乃谷等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对草原牧区（主要是内蒙古牧区）社会经济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内容涉及牧区社会结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文化宗教、婚姻家庭、人口迁徙，以及草原畜牧业生产、草地生态、牧区开发和传统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等许多方面。

以上只是对近期国内学术界关于西部牧区草地生态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主要研究进展所作的一个简要的概述。可以看出，近年来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动态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牧区草地生态经济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与日俱增，而且学术质量也在逐步提升；二是对草地生态问题和牧区发展问题的性质、原因和对策思路的研究在不断深化，对问题原因的研究正在从对表层现象的归纳向深层根源的探究延伸，对策思路的研究正在从技术层面探讨向构建总体发展模式演进；三是研究范围和参与研究的学科门类在日渐拓展，对牧区草地生态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已超出草原学、生态学、经济学的狭小范围而向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扩展，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牧区草地生态经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不仅大大拓宽了观察问题的视野，而且有助于提出更符合西部牧区实际的对策思路。

西部牧区草地生态经济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和进展，无疑为我们认识和解决草地生态问题与牧区发展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但是也必须指出，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晚，学术积累单薄，很多与之相关的研究只是在 2000 年前后才展开，因而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有不少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尚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探讨。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缺陷：

1. 没有把草地生态问题与牧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联系起来作系统深入的研究。草地生态退化问题的研究同牧区发展问题的研究相脱节，是现有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缺陷。目前学术界对草地生态问